

西青文史

第九册



天津市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西青文史

第九册

天津市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

书名题字:王怀勤

封面设计:阿 明

责任编辑:冯锡泉

封面图案:拾不闲(由杨柳青玉成号年画庄提供)

西青文史

第九册

天津市西青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印刷 天津市医科大学校办工厂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字数 145 千字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 册

津新出图字(99)第 003034 号 工本费 8.00 元

《西青文史》编辑委员会

编 审	刘聿旺	蒋志贤	
主 编	王乐和		
副主编	谢玉明		
委 员	刘文生	边世贵	王洪海
	刘新国	丁玉来	王宝铭
	郭冠英	邓学来	

目 录

- 一、赶大营·····谢玉明(1)
- 二、杨柳青年画·····谢玉明(112)

赶大营

谢玉明

“赶大营”是天津杨柳青人的创举。它萌发于清同治七年(1868),兴起于光绪元年(1875),光绪十年(1884)进入全盛时期,民国廿六年(1937)由盛转衰,陈迹遗存则延续到新中国建立。“赶大营”是在左宗棠率清军进入新疆、征讨阿古柏入侵的背景下兴起的,历经百年风云,创造了我国近代商贸史的奇迹。

“赶大营”以其丰厚的史实,留下了艰苦创业的经典。杨柳青人鸿猷创业,隼智刻苦。爱国爱乡,精诚备至。奇闻轶事,令人拍案。

当年,一大批被饥荒迫于绝境的杨柳青人,背井离乡,紧跟左宗棠西征的清军,肩挑小篓,沿途販售针头线脑和生活什物,以补军需不备和边民奇缺。因为追随军营做生意,称为“赶大营”。

光绪三年(1877)清军收复全疆,随之“三千货郎满天山”。光绪十年(1884)改为座商,逐渐形成规模庞大、财力雄厚的“天津商帮”,翘居“新疆八帮”之首,其余燕、晋、鄂、湘、豫、秦、陇各帮,均未形成与津帮商户足以抗衡的财势与社会影响。据《新疆图志》载称:“津人植基最先,分枝遍及南北疆。”

天津商帮俗称“天津帮”,在京津内地则称“新疆帮”,实属同一群体。自清军收复新疆,直到抗日战争之前,涌往新疆谋业的杨柳青人仍不绝于途,还在沿袭肩挑小篓、边行边售的方式进疆,因战事已行,无营可赶,则又改称“上西大营”,也叫“跑西大营”。又把

“西大营”做了新疆的代称。凡由新疆回乡的人，称为“大营客”。

“赶大营”是杨柳青人向贫穷命运挑战的伟大实践。鸦片战争以后，神州大地处于国弱民穷和极为复杂的社会条件下，杨柳青人却以顽强的毅力、舍生忘死的胆魄、汇合了几代人的智慧，使数千户的人摆脱了贫穷，获得发家致富的成功，这是杨柳青人始于近代的一次思想解放。既是创举，又是探索，意义深远。

“赶大营”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。“上西大营”是“赶大营”的继续和延伸，乡人通称“赶大营”。它经历了清军收复新疆的征战、推翻帝制、肇兴民国、军阀割据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。其间俄国发生了“十月革命”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、香港及其发动的太平洋战争，国内爆发了划时代的“五四运动”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变革。凡此都对远贸新疆的天津商帮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或要承受一定的代价和责任、甚至做出牺牲。新中国建立后，已是昨日黄花的赶大营，把遗存的人才和资源，投入祖国建设的怀抱，为“赶大营”划了圆满的句号。

“赶大营”是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。当年西出阳关的杨柳青人，在八千多里的征途上，不时冒着枪林弹雨，踏着血染的荒漠，或要面对时局多变的冤狱绳索、绿林响马的刀光剑影，在惊险倍加、举步维艰的年代，创造了难得的风光。留守家乡的父老妻儿却是孤灯残羹、煎熬着岁月，叹息“在外的男人，是无罪充的有罪的军；在家的女人，是有福守的无福的寡”。赶大营的杨柳青人，经历了世事百态的磨难，在功过、是非、曲直、正误的社会万象中寻求机遇，成串的悲欢离合，牵系着几代人的梦境。勤奋拼搏的成功，衣锦还乡的荣耀，也都难以冲淡当年的苦涩。曾以沉重代价“换来”的“万人同骨碑”，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佐证。

“赶大营”是杨柳青镇历史上的辉煌。它不仅是逃荒谋生，也不单是经商致富，当年清军平定新疆，从侵略者手里夺回了新疆这块占中国六分之一的版图，是来自杨柳青的“货郎担”有力的支援

了清军,把大量的军需物品,都用双肩送上前线,参加了那个时代的卫国战争。这是鸦片战争以来,清军唯有的一次、能够完全打败一个残暴的侵略者、收复全部失地、取得彻底的胜利。“赶大营”促进了古镇的发展,增添了津门的繁荣,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开埠,并导致新疆边城向大都会的进化,带动了陕、甘、宁、绥沿线的发展,成为沟通天山南北与渤海之滨经济、文化交流的先声;植根新疆的几代杨柳青人,为增进民族团结,做出了贡献。

“赶大营”是古今中外商贸史的奇迹。在桎梏奇多的旧中国,“赶大营现象”古来未有,国外也无类比,集其:年代之久、路途之遙、惊险之多、涉域之广、艰苦之极、规模之大、从者之众、获利之丰,影响之远等特点,均为古今中外之最,展现了古镇深邃的文明和杨柳青人的风采。如今“赶大营”的后裔遍布新疆,尤以乌鲁木齐为最,多已传代六、七,然而不唯从商。

“赶大营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自发的、而又是一次成功的移民大迁徙,它揭开了丝绸之路的封尘,洒下一条绚丽多采的人文风景线。

壮哉!赶大营,古镇的辉煌,天津的骄傲。

第一章 初 兴

第一节 创始缘由

一、左宗棠西征

左宗棠西征,为“赶大营”提供了条件和机遇。清代同治、光绪年间,钦差大臣、陕甘总督左宗棠在西北征战,使“赶大营”随之兴起。“赶大营”是紧密依附清军征战过程和进军路线进行的。

同治三年(1864),在陕甘一带已爆发的回民起义影响下,相继引发了新疆的变乱,纷纷发动反清斗争,戕官毁衙,势成燎原。

同年,太平天国覆灭,余部汇合“捻军”继续斗争。同治五年(1866)捻军在河南中牟分兵,张宗禹率“西捻”入陕,与早已爆发的回民起义呼应相援,形成“捻回合势”,使清王朝在陕甘及山西一带连失数十城池,清廷在新疆的统治大部分被推翻,但起义军的领导权最终落到封建教主手中,又形成拥兵割据,互相攻杀的乱局。

同治四年(1865),清王朝完全失去对新疆的统治能力,在西北“塞防”崩溃的情况下,位于中亚的浩罕汗国(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)军事头目阿古柏,在英国殖民主义分子支持下,乘机入侵我国新疆,盘据南疆喀什噶尔(今喀什市)等城。继于同治六年(1867)侵占了阿克苏城,悍然宣布建立所谓“哲德沙尔”(七城之意)汗国,自封为“毕条勒特汗”(意为幸福之王),同治九年(1870)阿古柏向北攻占了乌鲁木齐,又及北疆大部地区,消灭或降服了割据势力,把早已残败的少数清朝守军,迫退到北疆边境的狭小地带,新疆大部地区陷入阿古柏的野蛮掠夺和残暴统治之中。同治十年(1871)沙俄帝国乘机出兵侵占了新疆北部的伊犁。英、俄、阿古柏三个侵

略者同时对我国的新疆进行疯狂的掠夺，天山南北的大好河山陷入严重的肢解危机之中，新疆的形势已不再是抗清斗争的性质，而是英、俄帝国主义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权，妄图瓜分新疆。

清廷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，从原来只求平定陕甘，闭守中原的局限，进而发展到出兵西北规复新疆。同治五年（1866）调用一贯主张坚守西北“塞防”的左宗棠，由浙闽总督迁任陕甘总督（新疆隶属陕甘），同治六年（1867）加授钦差大臣，奉命督办陕甘军务。左同年进驻临潼，旋又转驰山西、直隶、山东，督剿回援“东捻”的张宗禹所部“西捻”。

同治七年（1868）杨柳青人安文忠初次跟随清军做肩挑生意，在西捻刚刚覆灭之后，左宗棠由坐镇保定、回师西安之际，清军分三路进剿陕甘回民起义军，攻夺城池，安文忠趁机往复随军贩售，时称“跑西北”。为以后由此诱发的“赶大营”传播了信息，寻找到途径。

左宗棠入陕初期，并无出兵新疆之意，只为“先灭西捻，再攻陕回”，俟打通“河西走廊”之后，固守陕甘，以防新疆之乱。奈新疆局势日益恶化，左才于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奏筹西征阿古柏，认为“关外（指新疆）一撤藩篱，虽欲闭关自守，势有未能”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，左宗棠复又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，拉开了进军新疆的帷幕，从此杨柳青人由“跑西北”衍变为“赶大营”，趋者日众。

二、杨柳青饥荒

社会动荡，战乱影响，灾害频发，导致了连年饥荒，是诱发杨柳青人“赶大营”的根本原因。自明代以来，杨柳青镇本是水陆码头、商贾云集、货来八方的富庶之地。鸦片战争以后，兵连祸接，地处京师门户的天津屡遭列强侵犯，近在咫尺的杨柳青多受战乱影响，民不聊生。

自清代咸丰、同治年间以来，到达杨柳青一带的太平天国北伐

军、捻军等人民起义武装，多次兵临京畿、进逼津门，严重威胁大清王朝的统治，帝国主义侵略军屡犯津沽大地，地处京津要冲的杨柳青，紧扼南北要道和内省关琐，遂成军家设防重镇，每受战局所累，铺户萧条，百业受阻，五行八作，半荒半废，一洗乾隆以来的繁华，社会不再升平。

夹流杨柳青的大清、子牙及南运诸河，也因战乱，失于修治，每有洪涝、非决即漫，农不可耕，舟不可航，镇民赖此为业者，恒难温饱。向以船业发达的杨柳青镇，自咸丰以来渐兴“火轮”海运，卫河废堤，趋于断漕，船户逐年递减，船工失业累增，至同治初年，船民不足百户，仅可短途杂运，或营“集船”（为赶集市的人提供客货运输）。偶有远载，又冒匪盗剪径之险，抑或被官府强抓“官差”。关卡杂税和厘捐时有加征，致使船业几于仃废，破产的船户和失业的船工，多浮于市。因之南粮不复北售，加剧了饥荒。

同治初年，尤多旱涝，间有蝗灾，十之八九，少见丰岁，镇上饥民骤增，被迫四散谋生。近则流入津门，以待来年。青少年齿，则投亲靠友，人访学徒，中青年壮丁可充脚行、杂佣，走投无路者便浪籍街头，市人谓之“灾民”。远则流徙东三省，以乞讨、垦荒、渔猎或“跑单帮”为生，称为“闯关东”。

同治六年（1867）大旱，“秋无薪，冬大饥”，时值左宗棠所率清军在直隶一带追剿“西捻”，翌春，在白沟与保定之间征调船只，装载清军战备物资转运入陕，杨柳青的饥民多充船工、纤夫应招。获悉陕甘一带生活什物匮乏，军民皆需，随船夹运星许，均可获利，军方并未严限，信息渐传乡里，乡人便三五结伴，以肩挑小篓寻迹陕甘，岁末携利还乡，年复一年，逐渐把饥民从流浪天津和“闯关东”，分流引向“跑西北”。

三、安文忠先导

安文忠“跑西北”，发现了随军经商的途径，成为“赶大营”的先

导。

同治七年(1868),左宗棠在保定立大营,调集各路兵马围剿“西捻”,张宗禹兵败徒骇河,“西捻”覆灭。清军战后物资急待启运入陕,沿河征用大船、召雇船工。安文忠(时年17岁)适从杨柳青“拉短纤”来到白沟,因战事初订,附地人不愿冒险受雇。军方约期两个月,加倍付酬,安文忠欣然应募。

安至西安兵站,闻知西北前线因战事激烈,交通受阻,勿论军民,日用品奇缺,可随军队后边贩售,能赚大钱,遂以结算的工资为薄本,又按当地习俗购置一付肩挑小篓,就地采购针头线脑、手巾、胰子(肥皂)、烟茶、小药之类的日用商品,沿途边售边赶军队,陆续到达郿州(富县)、洛水、董志原、庆阳府一带前线,果然商品出手很快,获利较丰。辗转贩售三年,远至青铜峡、定边。每次都需负重百十来斤的货物,随售随减。因战事激烈,军队忽东忽西,安也有惊有险,有时途经二十多村不见一人,饮食无定,甚至夜宿荒原,常见鲜血染地,横尸断路,安为贪利求财,均把惊险置之度外。

同治十年(1871),安文忠离家已届三载,顿发思乡之念,遂携带赚来的三百两银子,仍旧挑着小篓返回故乡,邻里皆传安文忠发财还家,轰动了杨柳青镇。本年又是大灾之年,引起镇上穷苦人家的羡慕。

安回乡做了一年多的小本生意,时因歉年荒岁,人们手头很紧,无利可图。

同治十二年(1873),直隶、天津一带洪涝成灾,薪如桂、粮如珠,杨柳青复发饥荒,安趁机结伙雇船远途贩粮,不意竟遭倾覆,把三年跑西北的积蓄付之东流,悔恨之余,重往大西北。沿途仍旧做肩挑买卖,盘旋年余才到兰州,获悉清军大营驻在肃州(今酒泉),前队已向新疆开跋,往征阿古柏。安文忠毅然肩挑小篓,日夜兼程,历时四十天,跋涉一千五百里,终于赶上清军大营,到达清军前线将领刘锦棠的驻地肃州城,决意跟随清军进入新疆。俟后,乡人

步其后尘，随军涌向新疆，时称“赶大营”。

第二节 随军西征

一、进疆经历

随军西征，时在光绪元年（1875）至光绪三年（1877），是“赶大营”的初兴阶段，也是最为惊险和艰难的阶段。它经历了清军征讨阿古柏的全部征战过程，配合清军作战，支前贩售。

左宗棠所率清军编伍庞大，主力有：豫军 16 营、蜀军 7 营、满洲兵 40 营、湘军 25 营（含回军 3 营），共计兵力 120000 余人，尚有随军的地方文吏、工匠、夫役 30000 余人，他们是战地最大的消费主体，兵燹之余的边民也迫切需要日用必需品，但购买力很低。官兵手头不乏银钱，却又很难买到商品，除粮台由军方自保外，其余所缺的手巾、胰子、布袜、腿带、针线、茶、烟、糖、辣椒、小药（薄荷油、避瘟散之类）杂品，数年之间奇缺，尤在战时，军队行动频急，甚缺青菜蔬果，赶大营的商贩，便应军营之约，远出百数十里连夜采运，轮番送上前线，依价取利之外，营官多加资赏，以示鼓励。

赶大营的先导安文忠，随军贩售期间，主要经历了清军攻克董志原、金积堡、肃州等较大的战役。于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九月，攻克肃州之际赶到城郊，由刘锦棠统领的清军大营，连绵十数里，声势浩大。肃州原在回民起义军马文禄占据时期，长达数年，几与内地隔绝，城内物资十分匮乏，在此驻扎的六万清军，更难买到用品，安文忠趁机贩售，往返数百里挖掘货源，二年有余，获利颇丰，渐有杨柳青人三、五结伴而来，日渐增多，至清军于光绪二年（1876）出关之前，已汇集四、五百人，并有秦、晋、陕、甘商贩夹杂其间。总共有千人之多。这一时期商品出手快、利润大，买卖比较好做。杨柳青的众多商贩，积极备货，伺机随军出关。

清军前线总指挥、马步总统领刘锦棠，鉴于军队日用品十分缺

乏,虽有银钱,也难买到,关内尚且如此,一旦出关,面临荒漠之地,人烟稀少,况且征途遥远,归日无期,军需供应更难。提出招募和鼓励商贩随军贩售的建议,经呈报大帅左宗棠核准,做为战略部署,召募商贩随军出关,并纳入军队后勤管理。从此“赶大营”得到军方的正式认可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)十二月同治死,翌年改元光绪。光绪二年(1876)四月二十七日,左宗棠在肃州发出了西征大令,盘旋于关内的数百名杨柳青商贩,遂即跟随首批清军出了嘉峪关。安文忠等取道玉门随军进疆,经由哈密、古城子、至迪化(乌鲁木齐)。

适光绪二年(1876)四至五月,天津一带旱情严重,夹有蝗灾,光绪三年(1877)六月,华北特大旱灾,蝗害并发,先旱后涝,杨柳青饥民骤增,连续二年重灾,“赶大营”者逾三千,形成第一次高潮。

光绪二年(1876)六至九月,清军由吉木萨尔、阜康、古牧地、迪化之间,摆开了长达五百里的战线,随军商贩多数汇集古城子(奇台县)兵站,冒着战火轮番接济前线,把地产杂品、副食品、蔬菜送到军营,有的商品是从境内老商户进货,这些由乾隆年间进疆的陕甘老商户,藏货惜售,闻知清军征讨阿古柏,竞相支持。有的商品需从关内进货,由军营提供车马运输协助,几经跋涉运入新疆。

当年六月克复乌鲁木齐,“赶大营”的首批商贩随之入城,军方划出一段街道,集中交易,允许官兵出营购物,叫“买卖街”,也往来于近郊妖魔山一带营幕之间贩售。军方在旷野圈出一片地方,供做交易,叫“买卖圈子”。因在“满汉回番”杂处之地,清军也有“湘蜀闽鄂”之分,主要是语言不通,更为安全起见,常结伴经营,互相照料,互通有无,进而出现三、五人“合营”,略有分工。

又至九月,清军肃清北疆时,部分商贩因势分流,随军进入北疆。

光绪三年(1877),清军连克吐鲁番、达板城(叛军重镇)、库尔勒(阿古柏在此兵败服毒,一说被部下内讧所杀)、阿克苏等城,至

九月南疆东四城收复，十一月克复喀什噶尔(喀什)和阗(和田)等南疆西四城。至此，除伊犁被沙俄侵占外，新疆全部平定。此间杨柳青商贩分随各营南下，最远到达喀什噶尔，南疆路远人稀，由近及远，商贩南去人数递减。此时已是“三千货郎满天山”，天山南北成为杨柳青人创业的大好去处，但多数集中在人口密集、交通方便的乌鲁木齐、古城子一线。由于战事已停，渐由随军贩售改为就近入城经营，结束了冒着战火随军贩售的阶段。

“绝域阳关道，胡沙与塞尘”使随军出关的杨柳青人，对此有了深刻体验，饱尝了“关外三绝”(巴里坤的冷，安西的风，吐鲁番的热)的淘炼；那时的清军已有了“开花大炮”、“劈山炮”、“七响洋枪”、“手掷炸包”等火器，敌方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，有了更为先进的军火，这批往来于战争边缘的商贩，有的亡于风寒病伤，有的死于流弹飞片，成为无名的忠骨。

随军西征，共经历较大战役二十八次，大战过百，克复了新疆南北十六大城，收回国土 360 多万平方公里，杨柳青人功不可殁。

二、军方管理

(一)颁发执照：商贩欲随军出关需向军营登记、领取执照。自清军攻克肃州，准备出兵新疆之际，在同治十三(1874)，由西征大帅左宗棠采纳了前线马步总统领刘锦棠的建议，颁令招募随军商贩，在肃州城门、街口张贴布告，公布管理办法。并由营官派员负责商贩登记，符合条件者，发给执照，准予随军出关。

在战时办理出关手续甚严，由兵站营官详细盘问来历，同行几人，要求互为担保，登录姓名、年龄、民族、籍贯等项，以及有何身形特征，均需注册备考，然后签押手印，但只准汉民出关。要求进疆之后，不准宣传邪教邪说、不许探问军情、不准贩卖鸦片、不准聚赌窝娼，并飭令所在营官随时稽查，倘有违犯，准由营官解送关内治罪，凡操有天津一带语音者，则被视为良民，因受回民起义的影响，

如系回民，则禁止出关，以免混入“奸细”，领发执照之前，还要检查有无夹带违禁物品，如：凶器、毒品、可疑文书之类，一切均妥，发给盖有军营关防的“龙纹执照”，俗称“龙票”凭此通行关外，在嘉峪关、玉门、安西系进疆必经之地设有关卡，验证放行。

在新疆平定以后，于光绪四年（1878），新疆各路关口只对商贩例行检查，如无可疑，则不再验看执照，即可放行。商贩再经嘉峪关进疆，只做盘查，不再发给执照。

（二）买卖圈子：清军进疆之前，始在肃州城内设立“买卖街”。在军营附近划一段街道，形同集市，军人可以出营购物，民众也可在此交易。

进疆以后，为了方便驻扎郊野的军营，便效仿“买卖街”的办法，在临近军营的地带，圈定商贩活动范围，叫做“买卖圈子”。军方因需要向商贩约定进货，官兵也可自选购物，这一办法沿用到光绪十年（1884）前后。各大军营驻地，一般都设立“买卖圈子”，在乌鲁木齐、哈密等大城之内则设“买卖街”。当地民众也可将自产的土特产品参加售买，光绪十年（1884）前后，逐渐转化为集市。

（三）设立官店：左宗棠用兵善于“缓进急战”，“缓进”时期多在运筹，清军各营均有招雇的工匠、伙役，全在营内安置也有不便；关外战线长、村寨稀、人烟少，控制长达数千里的军事运输线，中途需要站点，分程搭盖简易房屋和马棚，开办“官店”，每处数十间不等，用以安置工匠、伙役住宿，接待往来员弁，设官兵管理。为照顾“赶大营”的商贩，可凭“龙票”投宿，酌收灯油费。

（四）搭乘军车：清军的给养辎重，主要依靠畜力，除由地方招雇运力之外，军队备有骡马车、牛车、骆驼车或牲畜驮运，关内关外，军车往来频繁，遇有装载不满的车辆或空车，商贩可求助搭乘，军目和驭手通常比较欢迎，人货尽量上车，不收分文，商贩们自然也会拿出一些商品以赠，或敬以烟酒，以示酬谢。

有的商贩系应军营之约，专往采购青菜、瓜果之类，往往需远

途采运,营内酌派专车协助运输,免去商贩肩挑之劳,又可保证急需。

第三节 定点经营

一、选址建点

光绪三年(1877),十一月清军扫清南疆,阿古柏侵略军土崩瓦解,全疆平定。停战以后,清军供应趋于缓和,杨柳青人逐渐不再以军队为经营主体,把销售对象转向边民群众。左宗棠鉴于边疆已靖,策划稳定民生,是年筹设甘肃织呢总局,在陕、甘(辖新疆)境内倡导凿井兴田,恢复牧业、安归流民。新疆本来商品稀少,战后民用更加紧缺,边疆牧民却无经商习惯,使杨柳青人获得商机。

杨柳青人定点经营始于迪化也是“天津商帮”发祥地。迪化在清代隶归甘肃,筑有汉城迪化州,是通往南北疆的中心要道,战乱之后,城内地旷人稀,地多无主,入城者可以任意占地建房,初以安文忠为首在“大十字路”以东用草泥搭盖了简易住房,结束了常住官店的历史。另有李汉臣(杨柳青李家园,今十五街人,系清军出关前整治部队时,被裁汰的绿营兵弁)、杨润棠(杨柳青七星庄、今三街人,同治初年因抱打不平而误伤人命,被流放伊犁,其弟杨春华相随而来,曾在“缝屯”种地,光绪登基遇赦放出,来迪化前为小贩)、郑子澄(杨柳青人,曾是鱼虾小贩),他们都与安文忠相邻建了土房,各在路边摆摊设点,屋内仅能住人存货。战后物资来源有了变化,就地汇集本地土产和由伊犁流入的沙俄货物,有:洋蜡、煤油、纱布、方糖、小五金用品之类,也售由湖南、四川行商带来的茶叶、绸布等商品。四人摊位相邻,互有照应,互通有无。又轮流挑担到近郊妖魔山一带乡村和营房附近叫卖,并集资共同进货,按股分利,生意渐好。此后,陆续有杨柳青人到此占地建房,售货摊点